

狂飆時刻 —— 日治時代
台灣新文學的高峰期(1930-1937)

趙勳達 著



國立台灣文學館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

台灣文學史長編 10

狂飆時刻——日治時代
台灣新文學的高峰期 (1930—1937)

趙勳達 著

國立台灣文學館出版

狂瀾時刻——日治時代台灣新文學的高峰期(1930-1937)/ 趙勳達作。——初版。

——臺南市：臺灣文學館，2011.12

面：公分。——(臺灣文學史長編)

ISBN 978-986-03-1042-9(平裝)

1. 臺灣文學史 2. 日據時期

863.09

100027048

台灣文學史長編 10

狂瀾時刻——日治時代台灣新文學的高峰期(1930-1937)

作 者 趙勳達

主 編 李瑞騰

審 訂 許俊雅

執行編輯 林佩蓉

編輯助理 黃敏琪

校 對 林佩蓉、趙勳達、黃敏琪

美術設計 陳韻如

排 版 陳韻如

發 行 人 李瑞騰

指導單位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出版單位 國立台灣文學館

地 址 70041 台南市中西區中正路 1 號

電 話 06-221-7201

傳 真 06-221-8952

電子信箱 pba@nmtl.gov.tw

網 址 www.nmtl.gov.tw

經銷展售 國立臺灣文學館－雪芙瑞文學咖啡坊 (06-221-4632)

五南文化廣場 (04-2437-8010)

文建會員工消費合作社 (02-2343-4168)

南天書局 (02-2362-0190)

唐山出版社 (02-2363-3072)

府城舊冊店 (06-276-3093)

台灣的店 (02-2362-5799)

啓發文化 (02-2958-6713)

三民書局 (02-2361-7511)

草祭二手書店 (06-221-6872)

初版一刷 2011 年 12 月

定 價／新台幣 250 元整

GPN 1010004707 ISBN 978-986-03-1042-9(平裝)



●Printed in Taiwan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

●著作財產權人 國立台灣文學館

本書保留所有權利。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分内容者，須徵求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書面授權。請洽國立台灣文學館研典組（電話：06-221-7201）

目次 CONTENTS

總序 李瑞騰	4
--------	---

第一章 序言	9
--------	---

第二章 語言再改革與鄉土文學論戰	19
------------------	----

一、鄉土文學論戰的發展歷程	20
二、鄉土文學的爭議	37
三、台灣話文的建設及其困境	51

第三章 台灣文藝聯盟的結成與分裂	67
------------------	----

一、因「文藝大眾化」而結成	69
二、與彰化作家群、台灣文藝協會之間的齟齬	75
三、又因「文藝大眾化」而分裂	80
四、分庭抗禮：《台灣新文學》的發刊	93
五、分裂之後：《台灣文藝》的路線變異	110

第四章 左翼文學的興盛及其成就	121
-----------------	-----

一、台灣普羅文學的發展歷程	122
二、融合階級立場與民族立場的左翼文學	129
三、左翼文學的三個境界	150

第五章	多元共存的現代性風貌	167
一、科學主義與反迷信文學		168
二、現代主義與心理描寫		174
三、超現實主義的前衛美學		189
第六章	結論	217
文學年表		223
參考資料		229
後記		233

編輯說明

- 一、「台灣文學史長編」（以下稱「長編」）總計 33 冊，以台灣文學發展時間為軸線，編列各冊順序，以阿拉伯數字表記，分次出版。
- 二、「長編」各冊皆為獨立著作，每冊皆有「長編」總序、文學年表（台灣原住民口傳文學除外）、參考資料及作者後記。
- 三、「長編」各冊體例力求一致，惟尊重各冊作者書寫風格、部份用字及符號習慣。
- 四、「長編」各冊依作者視內容訂定「延伸閱讀」或「延伸學習」，放置章節之末，部份因全書結構之故，統一放置於參考資料中，提供讀者參考。

總序

針對作家創作行為及其表現的觀察與思考、評論與研究，總的來說可以用（一）理論、（二）批評、（三）歷史來涵蓋。「理論」可以說是經驗之系統化，處理「是什麼」、「有什麼」、「何以如此」以及「為什麼」等文學的性質與功能問題；「批評」包含詮釋分析和價值判斷，涉及優劣好壞等意義之彰顯；「歷史」包含思潮的激盪、社團與流派的起伏、文類的興衰以及典範的更迭等。前二者可以是各自獨立的範疇，也必將成為文學歷史建構的基礎。

我們把台灣文學視為在台灣這個地理空間所產生的文學，不論其族群、國籍及使用語言。這是一個寬泛的屬地主義，除了在地的本土作家，從外移入或是外移出去者，我們統統把他們編進台灣文學的範疇，前提是他們的作品之質量，一定得經過讀者與時間的考驗。這已涉及前述的理論與批評了，而我們今天要談台灣文學史，首先不可避免的要面臨這些課題。進一步說，「台灣文學」既已學科化，在大學體制內有了自己的系所，中文系，或者通識教育中心，也開設一些相關課程，因此，台灣文學史作為一個科目是必然的，相關的討論與研究必須展開。

以台灣文學史為中心，我們其實已有極豐碩的研究成果，這方面早有整編綜述的必要，但在諸多有關學者各自努力，以及文學史方法學的討論之外，我們可以有什麼樣的作為，讓喜愛文學的人對於

台灣文學有更宏觀的理解？這可能是我們必須進一步思考的。

我於 2010 年 2 月南來國立台灣文學館服務，一方面督導執行既定的事務，也爭取有限的資源擬定了一些新計畫，同時思索任內可能開展的要務。我一直以務實的行動派自我期許，涉及公共事務，特強調主客觀條件的密切配合，因此可行性常是思考的基點。

於是，我開始與館內同仁討論如何面對台灣文學史，同時也清理了當前國內外有關台灣文學史的出版概況，乃逐漸形成一個我稱之為「長編」的構想。為了有效落實，我決定用一個小型委託案來做規劃，那就是 2010 年 4 月底 5 月初啟動的「台灣文學史長編前期研究計畫」，邀請台灣師範大學許俊雅教授來主持，我們一起討論多次後，擬定了近 40 個主題；7 月起，由她帶領甫獲文學博士學位的顧敏耀先生共同執行，本館相關領域同仁也積極投入。同年 9 月，許教授交付館方上百頁的研究成果，自原住民口傳文學，至 1990 年代以後多元豐富的當代文學議題都有，預訂出版 33 冊，為了周全，我除了自己再三閱讀，與研究團隊討論，同時也將此計畫成果送外審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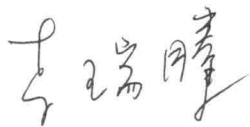
我們在 2010 年 11 月正式開始「台灣文學史長編」的撰寫，預計以三階段方式來完成。邀請來參與的作者以年輕學者居多，他們以其專業來面對負責的主題；在此過程中，對於編寫體例及諸多宜注意事項，我們都和他們進行了充分的討論。

「台灣文學史長編」從「原住民口傳文學」開始，接著才是明鄭

時期「漢文學的萌芽」；最後二冊為「原住民漢語文學」及「母語文學」。我們振葉尋根，尊重並肯定原住民的口傳文學及其後發展出來的漢語文學，珍惜多音交響的母語文學。至於明鄭以降，歷經清領、日治以及戰後，不同時期的文學現象，我們一方面彰顯其宏觀性，對於文學與政經環境的對應關係，重要的思潮、社群、流派與論爭等，都放大特寫；另一方面，對於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所形成的作家群體、時代文體、特種文類等，亦將儘可能做到細部觀察。

「台灣文學史長編」的編寫計畫，在前人豐厚的基礎上，有學界朋友熱情參與，相關同仁敬謹任事，故能順利推動，預計在 2012 年年底，整體呈現群體努力的成果。世事多變，時間從來都不會停下腳步，只希望當文學在浩瀚的空間穿梭之際，人們不要忘記前輩先賢用心回應變局、織句裁章的苦辛，我們將記下他們心靈的歷史，期待下一輪文學的輝煌盛世。

國立台灣文學館館長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stylized Chinese characters, likely the name of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Director.

第一章

序言



第一章

序言

時代背景

本文所稱之三〇年代，主要是指1930年至1937年這個時期，這個時期往往被文學史家視為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運動的高峰期，因此以成就而言，稱此時期為「文學狂飆」絕非溢美之詞。然而，此時的台灣文學並非綻放於富饒的土壤之中，當時的台灣社會是個被稱為「八面碰壁」的環境，此時台灣新文學之所以能成就高峰，正是在碰壁的環境中尋找出路的結果，因此在討論三〇年代台灣文學如何狂飆之前，有必要先理解當時的時代背景。

首先是經濟上的困挫。1929年美國爆發經濟大恐慌，隔年隨即波及全世界資本主義國家，造成世界性的經濟大恐慌，台灣也不能倖免於難。1931年，台灣文化協會（新文協）在全島代表大會上，便指出了「失業者如洪水似的激增不已」的現象。同年，無產文藝青年林克夫發表〈失業的時代〉一詩，言及：「一群群的勞動者，／洪水般地，／從工廠裡，／湧出去！」來形容經濟大恐慌下的失業潮。1934年台灣文藝聯盟的成立大會上，亦發出了「自從一九三〇年以來席捲了整個世界的經濟恐慌，是一日比一日地深刻下去；到了現在，已經是造起舉世的『非常時代』來了。看！失工的洪水，是比較從前來的厲害，大眾的生活是墮在困窮的深淵底下」的悲鳴。「洪水」象徵著經濟大恐慌對台灣社會的衝擊以及台灣人的恐懼，同時也意味著台灣人對殖民統治的不信任感。於是，經濟上的

困挫引發台灣作家的不平之鳴，同時亦將批判的炮火對準了台灣總督府及其經濟體制。

其次是文化上的困挫。1931年1月，黃周發表〈整理「歌謠」的一個提議〉一文，指出台灣小孩已經不會唱台灣歌謠，而盡唱日語歌謠，在這漢語與台灣舊有文化消失的危機感下，黃周才以「日就廢頹的固有文化的保存尚不可不作的目的在焉」作為號召。台灣舊有文化的衰頹與殖民政策之間無疑有著緊密的關係，這便是同化政策的展開。語言向來被視為同化政策的工具，而國語政策的推行便可視為同化政策的基礎。當時不管是學校教育抑或社會教育，都極度積極推行國語政策，更何況那時恰逢九一八事變以及經濟大恐慌的打擊之下國庫預算緊縮的時代，不過總督府卻對市街庄等級的教育設施提供了補助，這是極少見的特例，由此可見當局普及國語的決心。國語政策推行的成績，使得台灣人的日語理解率從1930年的百分之8.47，隔年暴增到百分之20.4，到了1940年更達百分之51，其間的成長幅度之大，令人咋舌。在國語教育的威脅程度從步步進逼轉變成大幅躍進之下，台灣人失去母語與文化主體的焦慮感也就不言可喻，在1929年連雅堂就因此起而提倡「整理台語」，並明言：「余懼夫台灣之語日就消滅。民族精神因之萎靡。」¹已深刻認識到語言和民族精神之間互為依存的關聯性，這就是進入三〇年代之際，台灣人民所感受到的逐漸被同化的焦慮感，而這股焦慮感，也正是黃石輝、郭秋生等人在三〇年代初期提倡台灣話文的心理因素。郭秋生同樣有著「言語不但是集團生活的反映，更就是民族精

1 雅堂，〈台語整理之頭緒〉，《台灣民報》288號，1929年11月24日，頁8。

神的體現」²的認知，承襲了連雅棠的邏輯，由此可見，台語整理的提倡與台灣話文運動的推動，無疑台灣作家有意識地拒絕殖民統治策略。

再者是思想上的困挫。二〇年代中期，台灣社會開始接受了左翼思潮，馬克思主義的思維成為台灣民族解放的另一個選項，從而導致了1927年台灣文化協會的分裂。之後，台灣共產黨、台灣農民組合的次第成立，以及分裂後左傾的台灣文化協會（新文協），構成了左翼思想傳播上堅實的據點。而後由於經濟大恐慌的暴發，以及共產國際對無產階級革命的鼓動，使得台灣社會更是呈現一股蓬勃的反殖民思維。然而經濟大恐慌不只影響了台灣人的思維，也影響了日本帝國的統治策略，當時為了尋求資本主義過度擴張的出口，日本便以帝國主義作為打開中國大門的手段，1931年的九一八滿洲事變便是如此；也由於經濟大恐慌的環境成為各種社會主義運動發展的溫床，因此在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之際，必先掃蕩國內左翼運動的勢力，以確保後方的安定，論者陳芳明就指出，1931年日本發動瀋陽事變入侵中國東北，「它對殖民地的統治也開始採取高壓手段。作為殖民地的台灣，便無可避免地受到日本軍閥當權者的肅清」³，而肅清的具體行動則在於對島內的左翼政治組織進行檢舉、逮捕和解散的工作，台灣共產黨的滅亡，台灣民眾黨的瓦解，台灣農民組合的癱瘓，台灣文化協會的停滯，都是在這一年次第發生。當年的社會運動團體唯一倖免者，是具有右派色彩的台灣地方自治

2 郭秋生，〈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中島利郎編，《1930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2003，頁12。

3 陳芳明，《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台北：麥田，1998，頁32。

聯盟。此外，肅清了左派的社會運動之餘，日本殖民政權也不忘肅清左派的文化運動，因為當時的左派文化運動，被台灣總督府認定為「企圖把文化鬥爭與政治鬥爭結合起來，把組織基礎放在工場農村，採取共產主義團體的組織原則，外表內容均作為日本共產黨的外圍團體展開活動」，因此《伍人報》、《洪水報》、《明日》、《台灣戰線》、《台灣文學》等具有左派色彩的刊物，也紛紛在控制與查禁之列。⁴最後，值得附帶一提的是，1937年日本發動盧溝橋事變侵略中國華北之前不久，台灣總督府在台灣先禁用了報紙雜誌的漢文欄，並且強制廢止漢文書房教育，此外還將1931年倖免於難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也一併禁止，因此，日本帝國主義的對外擴張與對內思想控制的必然性，毋須贅言。於是，政治運動的困挫，使得參與者紛紛轉而投入文學運動，卻也意外造成了文學運動的蓬勃。

文壇結構的變遷

1920年7月，旅日台灣知識青年在東京成立「新民會」，並發行機關誌《台灣青年》，開啟了台灣文化啟蒙運動的序幕，當時台灣知識青年有感於台灣文化之低下，開始摹仿五四的模式推動台灣島內的文化啟蒙運動，期待能夠「使民智日開，而進於文明之域」⁵。接著，台灣新文學運動相繼以《台灣青年》、《台灣》、《台灣民報》等刊物作為提倡的平台，並歷經陳忻〈文學與職務〉、陳端明〈日用文鼓吹論〉、黃呈聰〈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黃朝琴〈漢

4 參見王詩琅譯註，《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台北：稻鄉，1995，頁505-514。

5 王敏川，〈《台灣青年》發刊之旨趣〉，《《台灣青年》創刊號，漢文之部，1920年7月》，頁41。

文革命論》的鼓吹之後，到了張我軍於1924、25年間在《台灣民報》的大力提倡才宣告成形。由於複製中國五四新文學運動的成功經驗，使得二〇年代台灣新文學運動甚至被視為五四運動的「台灣版」。⁶

然而，這種祖國意識以及對中國的依賴情結在三〇年代開始產生質變。首先是鄉土文學與台灣話文的提倡，標誌著一種以台灣為空間、以台灣話為書寫語言的文學形式，對於在台灣文壇長期佔據主導地位的五四文學模式而言，無疑是極大的挑戰。具體的事證可由《台灣新民報》文藝欄的作品比例之變化來加以觀察。在二〇年代，《台灣》雜誌之所以改組為《台灣民報》，就是為了提倡白話文⁷，因此《台灣民報》自然負擔起推動白話文運動的重任，雖然《台灣民報》上由張我軍掀起了新舊文學論戰，而充分表現其打倒舊文學的論述與立場，不過此時台灣新文學尚在搖籃時期，台灣作家的新文學作品十分有限。或許是為了提供學習的機會，《台灣民報》的文藝欄上充斥著中國五四文學作品，所以看似精彩的文藝欄，其實大部分的篇幅都成為中國文學的展示場，黃得時在〈台灣新文學運動概觀〉中就提及1927年至1932年的《台灣民報》與《台灣新民報》有許多作品是直接轉載自在中國所發行的《民鐘》、《國聞週報》、《現代評論》、《泰東月刊》等刊物。⁸以下我們可以從簡表看出中國文學充斥《台灣民報》與《台灣新民報》的現象。

6 葉榮鐘，〈台灣人的唯一喉舌——台灣民報〉，收於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文獻資料選集》，頁220。

7 楊肇嘉，〈台灣新民報小史〉，《楊肇嘉回憶錄》，台北：三民，1977，頁414-415。

8 黃得時，〈台灣新文學運動概觀〉，收於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文獻資料選集》，台北：明潭，1979，頁290。

《台灣新民報》上中國小說比例一覽表

年度	小說總篇數	中國小說篇數	比例（%）
1929	74	53	72
1930	82	42	51
1930	92	12	13
1932（至4月9日止）	22	0	0

註：小說篇數皆以刊載回數計算，亦即同一小說連載五回即算五篇，如此較能呈現篇幅的比例

1929年《台灣民報》文藝欄上的中國作品佔了百分之72，到了1930年還有百分之51的高比例，可見在邁入三〇年代之際，作為當時台灣文壇最大發表舞台的《台灣民報》文藝欄，實際上受到了中國五四新文學相當大程度的宰制。在1931年後，《台灣新民報》文藝欄的中國作品頓時減少許多，可以發現台灣文壇脫離中國文學作品宰制的現象，這一方面受到了此時台灣普羅文學路線建立的刺激，另一方面鄉土文學論戰的爆發也促進了台灣作家創作意願的提升，原本文壇的作品幾乎出自彰化作家賴和、楊守愚、陳虛谷等人之手，1931年後多了許多生力軍，因此《台灣新民報》文藝欄不再需要依賴轉載中國文學作品來「撐場面」，而到了1932年，中國文學作品已完全退出《台灣新民報》文藝欄。文壇結構的如此變化，意味著台灣作家的大量登場，另一方面也意味著台灣文壇獲得了自主性，此時鄉土文學論戰的討論以及日後台灣文藝聯盟的結成，都可以看出台灣文壇的成形。

「文藝大眾化」的各自表述

在三〇年代，文學運動的興起刺激了知識份子對文學的功能性展開深度思考，和政治運動一樣，「大眾」的群聚力量是作家覬覦、